

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金普森 易继苍

摘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关键词 资产阶级 买办 东南社会变迁 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59(2002)04-0048-08

传统与变迁,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东南和东北的社会变迁,而东南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东南沿海城市的变化。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广大农村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农村变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而东南沿海城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处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前沿阵地,受西方国家的影响最深,因此也就带来了东南沿海城市的巨大变化。我们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阻碍中国社会进步,这是不错的,但是资本主义帝国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在当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比较而言,应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至少要求你有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希望这个政府尚能生存,尚能统治全国人民,并从人民大众中收集财富,用于购买国外商品,这是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必须首要完成的任务。由此而滋生的中国近代买办就是为了适应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基本任务而产生的。

的,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买办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产物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买办曾是西方国家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买办在中国的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特别是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总的历史条件下,买办有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我们说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潮流亦是历史必然,那么,买办的产生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 金普森(1932-),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财政经济史研究;易继苍(1972-),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的开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在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点。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有所发展,但并未对传统经济结构产生质的突破。鸦片战争不仅把古老的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而且使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面临严峻挑战,激起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追求早期近代化的迫切愿望。近代意义上的买办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关于近代买办的产生,原因很多,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外语言不通,外商不能直接与华商交易;还有的认为,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力,外商必须通过“中国封建社会所固有的流通渠道去完成商品的购销活动”,出于“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①出发,使外商与中国人走向联合,从而产生了中国的买办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近代买办的发生、并逐渐壮大,是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走向开放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中国所进行的早期近代化是在丧失国家主权,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近代化运动,而是要受制于其它先近代化国家。这是半殖民地国家的近代化所共有的特征,中国在这方面尤为显著。

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变为其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这一目的出发,他们也会局部地将中国引向近代化道路,但他们又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牢牢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不会让中国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让中国成为他们的工具,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洋行扩大对中国各方面的经济侵略。例如中国的轮运业,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其经济侵略的需要,纷纷在华设立轮运公司。以上海为例:从 1862—1885 年设立了如下几家轮运公司,^②见表一:

表一:上海的外资轮船公司
1862—1885 年

公 司	创 办 者	国 别	创办年份
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洋行	美	1862
公正轮船公司	加罗花洋行	英	1867
北清轮船公司	淳裕洋行	英	1868
太古轮船公司	太古洋行	英	1872
华海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1873
扬子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1879
怡和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1881

从上述轮运公司的成立可略见外资对中国轮运业控制之一斑,但是这些轮运公司的存在与发展如果离开了买办就会寸步难行。首先,外商轮运公司需要利用买办商人筹集资金。例如在上述几家轮运公司的创办中,买办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见表二。例如在旗昌轮船公司一百万两资本中,陈竹坪投资为十三万两,顾丰盛十五万两。而且顾还是金利源的主要投资者。除旗昌轮船外,陈竹坪还投资于琼记轮船。1874 年时,旗昌轮船公司的买办商人投资已达六十万两。

表二:上海各轮船公司买办的资本统计 *^③

1862—1875 年					单位:两	
年份	公司名称	创办者	国籍	开投资本金数	买办资本	
					实数	%
1862	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洋行	美	1,000,000	330,000*	30
1867	公正轮船公司	加罗花洋行	英	170,000	51,000*	30
1868	北清轮船公司	淳裕洋行	英	194,000	58,000*	30
1872	太古轮船公司	太古洋行	英	970,000	0	0
1873	华海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	英	325,000	60,775	18.7
1873	招商局	官督	中	612,000**	476,000	77.8
总 计				3,271,000	975,775	29.8

原注: * 估计资本额。 ** 包括政府贷款 136 000 两。

从两表中可以看出,各资本主义在华轮运公司的设立离不开中国商人的投资。其次,洋行需要买办商人为其提供轮运货源。“当一家洋行或几家洋行力求扩大营业额的时候,简单的运费协议是难以执行的,怡和洋行已成为劲敌,因为这家英国洋行通过买办,与中国商人保持着良好关系,坐享额外的好处。……唐景星在组织该公司的中国雇员方面,以及在与上海和天津货主保持联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④再次,是通过买办拉拢华商,增加货运量,维持经营。

以上说明,外资轮运业中是离不开中国买办的。这只是外资在华企业中的例证之一,其实,在所有外资在华企业中,哪里有洋行,哪里就有买办身影的出现。外资在华洋行需要买办的存在,需要买办为其经济活动服务,通过买办将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始终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是中国近代买办所产生的首要条件。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自身来讲,由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在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的权利,在社会内部又存在着大量封建主义因素,自给自足封建主义经济结构,以及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严重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历年的外国侵略战争,国内农民起义,以及政府的贪污腐化,使国家财政陷于崩溃境地,没有独立进行早期近代化的经济实力。虽然,洋务

运动在企图实现富国强兵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有抵御外敌、挽回利权的动机,并且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琴弦,维新运动也点燃了民主运动的火花,清末新政开始了传统社会体制的松动,这似乎有利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但实际上,不仅在资金、技术上都需要依赖先近代化国家,而且在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上也要依靠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这样,买办就成了洋人与政府之间的媒介。例如,洋务派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以浙沪富商朱其昂为总办,他既不熟悉对外贸易,又缺乏经管轮船航运的经验,在招商局造成管理不善、用人过滥、浪费严重,致使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轮船招商局罗致多年从事买办职业的唐廷枢、徐润入局,唐、徐的买办生涯,不仅使他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为他们投资近代企业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取得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丰富知识和实际经验。唐廷枢入招商局,首先将自己担任买办和经商所得作为投资带入招商局,并将委托外商经营的“南洵”、“洞庭”、“水宁”、“满族”等号轮船随带入局。在第一期招股中,唐廷枢至少投资8万两,徐润投资前后总达48万两。^⑥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呈现一片勃勃生机,从1878—1879年利润达869210两,到1883年轮船招商局的资本达200万两。

连政府所倡办的近代化工业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华人自办的民族工业了,他们不仅要依赖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遭受封建主义的层层盘剥,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例如:由刘鸿生创办的华东煤矿,煤炭出厂价每吨不足三元,但是煤炭运到上海所需的特别费用,即官府所勒索的费用每吨达三元七、八角之多。此时的政府对于洋人是百依百顺,洋货在中国畅通无阻,华人就只有在外国人的洋行中求生存。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充当外国洋行的买办,这不仅可以取得丰厚的报酬和佣金,取得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还可学到外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可以这样说,买办是最善于把握时机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买办的产生是被逼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腐朽的清政府所逼的产物。此时买办应运而生,有其必然性。简单的将买办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豢养的走狗是值得考虑的。

一般来说,凡是落后国家的近代化运动都是在先实行近代化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或威胁下进行的,从其一开始都带有一种“防御性”的被动性质,这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自身的传统文明根深蒂固,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在鸦片战争之前,顽固的封建主

义农业文明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皇权和顽固的农本思想,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广大平民都以“中央大国”自居,盲目尊己排外,固步自封。历代封建王朝实行尊王攘夷、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既阻碍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输入,又遏制了本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仍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到鸦片战争后,昏睡中的古老民族被西方隆隆炮声惊醒,他们对于近代西方文明这位不速之客既不认识,也不需要它,称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但是历史的潮流已经无情地证实: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华帝国已经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潮流,虽是泱泱大国,但已弱不禁风。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斗争中,清政府中的某些开明绅士与官僚开始注意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并着手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例如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知识分子魏源、王韬、薛福成等,这反映封建社会上层部分人士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冲击下,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认识有所加强,对其态度有所松动。但广大平民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畏惧与无知却依然照旧,还不能接受西方文明,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使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但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工业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旦打破封建主义的坚冰,其发展必将势不可挡。因此,中国需要一批比较了解西方文明的近代人士,对西方文明进行传播。这样,在士大夫中就出现了魏源、王韬、薛福成等,在封建官僚中就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但是这些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还不能为广大平民所了解与接受。社会的发展在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同时,在官、绅与民隔绝的情况下,社会需要另一批对西方近代文明有所了解的人。伴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来华而生的买办客观上就担负起了这一角色。因为他们最早与西方交往,最先接触西方文化,最先感受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优越性,最先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科学技术,最先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

其次是,早期买办主要是来自封建官商,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强,不少商人也加入到买办的行列中来,其中有不少平民子弟也加入这一行列之中。就是其中的官商在封建主义体制下也是属于社会下层。例如,著名买办唐廷枢就出生寒微。郑观应虽出生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但“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⑦历尽“走奔之劳”,终成大业。买办朱葆三,幼时家贫,14岁即只身来到上海学艺,仅带一只旧竹箱和一个旧铺盖。买办虞洽卿,一个宁波农村的拾泥螺的孩子,15岁到上海做学徒、跑街到买办,终成上海大亨。刘

鸿生出生于平民家庭,17 岁时辍学,开始自谋生路,等等,这些出身穷苦的下层人士,依靠买办职业逐渐飞黄腾达,他们当上买办之后将自己的亲友带进自己的买办职业中,为广大下层平民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

再次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是伴随着血雨腥风进入中国的,以野蛮侵略方式打开中国大门,这就使中国官民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产生一种普遍对抗心理。例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这些侵略战争使中国官民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抵抗相当严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近代化运动多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等不得不采用西方工业文明,带有明显的“防御性”的特色。所以这种近代化运动也始终停留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保教”、“保民”、“保种”基础之上。这种“防御性”近代化运动很难影响深入,特别是甲午战争惨败,使国人更加认识到:光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并不能拯救中国,还要学习西方的商业、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进程需要将那种“防御性”近代化变为主动,需要有人去消除国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对抗心理。因为买办常与西方工业文明打交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虽大多数买办并未从理论认识高度去指导他们的行为,但从客观实际上,他们执行了这种职能。在这一方面硕学买办郑观应表现得更为突出。郑观应主张改革制度,首先要实行议会制度。他认为中国要放下中国即“天下”的儒学观点,使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他反对清流党鼓吹的对外好战政策,主张自强,谨慎对外;郑认为西方的富强源于财富,财富源于工商,并且认识到工商是西方富强的原动力,因此,中国进行“商战”比进行“兵战”更为重要。郑观应的观点,代表了通商口岸以买办为主的新式商人的共同观点。

以上是中国在进行早期近代运动中所面临的三个问题,即:进行近代化的非自主性、复合性、带有“防御性”的被动性。同时这三个方面也是中国买办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在完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在西方隆隆炮声的掩护下进行的,因此最早进入近代化行列的不是完全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府,也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而是较早接触了解西方文明的人群。在官僚中以洋务派为代表,在知识分子中以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为代表,那么在工商业中则以买办商人为代表。近代买办的产生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卵翼下而产生,但是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买办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买

办性,但它并不是反动透顶,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为“走狗”。应该说,买办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坚冰,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瓦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具有其历史进步作用。

二、买办是一身而兼有双重身份的群体

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进行政治、文化活动,最终目的是对华进行经济活动,政治、文化活动为经济活动服务,而经济活动的急先锋是外商在华洋行。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与英人有往来者,或者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获得皇帝的恩准免罪;1844 年中美签订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对买办做了明确的规定:美国“贸易船只,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各听其便。所有工价若干,由该商民等自行定议,或请各领事馆酌情办理;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这样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雇用买办就有法律依据。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向东南通商口岸的不断扩展,外商在东南沿海城市纷纷设立洋行,作为中外贸易媒介的买办也随之在各通商口岸迅速发展起来了。最初买办主要集中在广州一隅,随着中外贸易中心的北移,福州、宁波、上海、厦门等东南沿海城市也相应地成为买办的集中地,买办人数也逐渐增加,到了 50 年代,买办已成为社会上引人注目的一种职业,已露出别具一格的端倪。到了 60 年代以后,随着外商洋行的急剧增加,买办队伍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据海关统计,1875 年在华外商企业总共有 343 家,1895 年达 603 家,19 世纪末达 933 家,到 20 世纪初达到 9511 家,如以 1919 年在华外商企业 8015 家为标准计算,平均每家先后雇用正副买办 5 人计,则担任买办的人数总数已达 4 万人。其实每家商行所雇用的买办远不止 5 人,有人估计每家约雇用买办 10 人,则买办总人数可能已超过 10 万。^⑦

买办首先是洋行的雇员。买办受雇于洋行,为洋行服务,其主要职责是充当“洋行总管”、“业务副手”与“内地采购者”,^⑧这些职责主要体现在流通领域之中,即商品的进口和出口业务中。在进口方面,货物由洋行流向买办,由买办流向华商,再由华商流向万千商棧;在货物出口方面,土特产品由生产者流向华商,经由华商流向买办,再由买办流向洋行,最后经由洋行出口国外。买办最初受雇于洋行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帮助洋行推销外来商品,收购内地诸如棉花、丝等土特产,也就是说,买办充当了中外进出口贸易的中介,是一个经纪

人。我国经济史学家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把我国同外国正常的贸易等同于鸦片武装走私和贩卖人口,统统贬斥为“商业侵略”或“商品侵略”,因此买办也就相应成为外国商品侵略的帮凶,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中分得一杯余羹。不平等的条约虽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巨大的影响,但不能把同国外的正常贸易简单地用“侵略”二字加以概括。当时的中国虽被强行卷入同外国的经济往来,但是关于进口货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商品的价格,毕竟仍受中国国内市场的制约,需按照中国消费者的喜恶、爱好做出明智的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依靠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影响这种出口贸易巨大障碍的最大原因“乃是那个依靠这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⑨中国人不需要的东西,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济于事。同样地,中国的出口贸易也不是简单地用“掠夺”就可以概括的。外商就像不能强迫中国人买东西一样,也不能强迫中国人向他们卖东西。洋商要买,华商愿卖,才能成交,这才符合经济规律。

买办在进口贸易中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洋货深入至穷乡僻壤,老百姓纷纷“弃土从洋”,洋货从洋商手中向买办流动,再经由买办流向万千商栈,由商栈至千家万户;买办在出口方面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架通了千家万户同洋商联系的桥梁,使农民可以从中获利。例如进口业中的煤油,“光绪以前,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莹莹如豆。未几,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于是,上而缙绅之家,下至蓬户瓦牖,莫不采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⑩美孚石油公司通过买办或经理人,打开了我国广大的农村市场,使煤油取代了我国几千年来民间沿用的植物油和土制蜡烛,因为煤油比植物油要亮得多,并且价格比植物油便宜;又如洋布和其它棉织品,到19世纪80年代,由于洋布“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到了90年代,则“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⑪至于说“如手帕、毛巾之类时新货物,在中国人中间日益流行,需求量迅速增加”。^⑫此时的老百姓已不再像开埠初期那样,对西洋事物极度恐惧,而是通过比较,已初步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进性。

从出口贸易来讲,鸦片战争之前,生丝和茶叶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战后至19世纪70年代,丝、茶两项的出口仍占中国出口总额的94.7%。70年代以后,大豆、苧麻、猪鬃、羽毛、皮革、草席、帽辫等成为中国新的出口项目,这些产品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1905年

时,“则直线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八,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⑬这与买办们的来往奔走不无关系,如在19世纪40~50年代,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们就开始深入到长江中下游的口岸,如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进行丝茶等土产的收购,将收来的土特产售与洋行从中牟利。买办的这些活动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土特产的大量出口,活跃了农村经济。例如产丝地区,《申报》的一篇《时评》曾经报道:“我国农村经济,向持农作物收获以外之副业以为调剂,农民若纯粹持农作物经营之一端,则费力多而获利薄,……尤非副业之补助不可。”^⑭“丝价跃起,蚕桑之业愈盛,农户亦因而重蚕桑轻种田,以蚕农一月之功,苟得丰收,一年生活就取给于此。”^⑮显而易见,生丝出口对我国农村经济的荣枯具有重大关系。

作为洋行的雇员,买办收入最初是靠服务洋行的工资和推销商品所得的佣金。作为买办的工资年薪一般为500两到2000两不等,“单纯从工资收入看,买办作为一种职业,按照当时的标准,也算不得是阔差事,更谈不上暴发。唐廷枢是作为怡和的总买办而入选的。但是他的个人的薪资收入,每年为一千五百元,一个月不过一百二十多元。”^⑯由此可见,工资并不是买办的主要收入。有人说买办是靠佣金发财的,其实买办所得佣金仍是十分有限。19世纪60年代以后,佣金制度建立,最初买办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有所下降,降至1%,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这一水准,到90年代初则进一步降为0.5%至0.25%之间。有人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平均每年不过一亿五千万海关两上下,在1865-1894年的30年中,贸易总值累计为四十九亿海关两。^⑰30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并且所有的进出口业务都经买办之手,都抽取佣金,佣金额也不到一亿两。按最低比率计算,佣金额不过一千二百多万两,这显然不是数以万计的买办得以暴发的主要财富来源,对于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寄生虫的结论也就不攻自破。

那么买办致富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买办不但是洋行的雇员,而且是自营商业的生意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而且是货物的主人;不仅赚取工资和佣金,而且赚取远比工资、佣金更多的商业利润。买办自营商业,一般是经营与他所服务的洋行业务相关的行业,如唐廷枢当上买办之后,就与人合开谦慎安茶栈;^⑱徐润当上宝顺洋行的买办之后,也进一步扩大自己原先在丝茶方面的投资,开设宝源丝茶土号、顺兴、川汉各货号等;^⑲旗昌洋行的买办顾敬斋,在担任买办期间,不仅兼营丝业、且创办了乾康丝厂,他既是丝业会馆的董事,又

是场丝茧业总公所的发起者之一。^②如上海丝业中,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原为顺泰丝栈主,受聘为洋行买办之后,又开办润纶丝厂;^③著名丝商黄佐卿于19世纪70年代自筹资金在上海江西路开设了一家祥记丝栈,生意十分兴隆,赚了一大笔钱,后任英商公和洋行买办,并在1881年用他经营丝栈和担任洋行买办所赚的10多万两银子开办公和永丝厂,又名祥记丝厂,后又陆续开办新祥记丝厂,裕晋棉纺厂。^④这类新式企业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与进口相关的新式企业,二是同出口相联系的企业。有人把1900年--1905年上海出现的类似较大的761家企业做过如下统计:经营进口洋货的企业有洋杂货业428家,五金、煤、钢铁业90家,洋布业63家,煤油业6家,颜料业7家,糖业15家,土业即鸦片业30家,共计639家;经营出口土货的企业有丝业51家,茶叶34家,皮货业7家,油麻业15家,蛋业15家,共计122家。^⑤这一类的企业很多是由买办创办的,因为这类企业或多或少的要同外商发生联系,买办利用其同洋行的良好的关系建立此种企业,经营进出口业务。“这类企业经过进出口贸易渠道,已成为国际资本大循环的一部分,其经营方式也逐步近代化,”表现为“首先,其利润来源不再是远远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贵卖所得,而主要是来自正常的购销差价,比较符合于国际经商惯例。”其次是这些企业不再采用“旧式的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而是采用具有资本主义经营色彩的“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或批零兼营”^⑥等新的成交方式。因此,买办已经和新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广泛和紧密的联系,他们的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形态已不同于旧式商人,出现了某些新的价值趋向,在总的趋势上,买办们总是坚定地支持经济现代化的,因此买办应该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雏形。

买办利用其同洋行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买办成为中国最富有的阶层。据统计,在19世纪末,中国已有买办1万人以上。在这一阶段,中国买办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根据一个比较全面的统计数字,1840年至1894年这54年间买办的收入就达4.9亿两,这些收入中还不包括买办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人经营所得^⑦。根据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全国财政收入的统计,中国这一万名买办的收入相当于40-60年代中国财政收入平均额10年的总和。在这4.9亿两中,用于买办消费的约占60%,约3亿两,在这54年中买办共积累资金1.97亿两,这个数字是惊人的。^⑧

正是由于买办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依靠洋行在华势力,依靠各资本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一夜之间暴富,这就涉及到中国近代的买办资本问题。特别是东南沿海,

手握巨资的买办们,在长期与资本主义经济打交道的过程中,深知近代企业所带来的滚滚利润,于是纷纷投资近代企业,就更进一步促进东南沿海的近代化。

三、买办是中国最早改变投资理念的阶层

追求资本的无限扩张、兼并和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旋律,但在近代中国却不易弹奏好。如果说在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曾显赫一时的行商和盐商因资本找不到出路而衰败是一种时代的无奈与悲哀,那么“红顶商人”们面对新的投资领域却无动于衷,则完全归因于他们身上浓厚的封建旧式商人因子的惰性。中国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会成为历史的弃儿。毫无疑问,近代中国,买办是中国最早改变投资理念的群体,他们是在为外商的代理活动中,受西方商业精神、商务习惯的熏陶下逐渐产生的。

买办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财富,但他们对自己的财富却有比旧式商人更强的增值欲望,只不过这种财富的再投资被处理得特别小心而已。在当初,最谨慎可靠的投资莫过于附股在华外商企业,这是早期买办资本的出路之一。大多数买办都投资于自己服务的洋行或该洋行所经营的某一特定企业。例如19世纪60年代的旗昌洋行,华股就占总资本的六成以上,其中主要股东就是该洋行的买办或由这些买办拉来的中国商人。

买办资本的出路之二就是投资与其服务洋行的业务相关的商业。如前所述,这种投资一般由买办独资或与其他中国商人合资。买办的此类投资虽有与洋行抢生意的意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洋行并不出面阻止,有时甚至给予鼓励,有些洋行在雇用买办时首先要求其是一名生意人。当谈及买办资本的此类出路时,大量买办资本投入钱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唐廷枢就投资开设了泰和、泰兴、清益三家钱庄;徐润投资开设过敦茂、协记钱庄;洞庭山买办世家席家席正甫、席立功、席聚星等就开设协升、久源、正大等钱庄。^⑨大量买办资本渗入钱庄,一方面反映买办群体金融意识的成熟,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外商对钱庄信用需求的增大。五口通商之后,中国旧式钱庄很快就成为洋行的业务机关,洋行必须借助于钱庄的庄票方能开展业务;而庄票能成为流通领域的支付凭证,必须得到中国商人、外国商人、外国银行的认可,买办的参与正好弥补了各方面的关系。部分地扫除了中外贸易的某些障碍,又大大提高了钱庄的实力与融资能力,使旧式钱庄与新式金融业务相联系,促进了钱庄经营的近代化,这也许是中国传统两大金融系统一

票号与钱庄,钱庄趋于发展,而票号很快趋于消亡的奥秘所在。

买办资本的第三条出路就是投资于中国自办的新式企业,自从买办资本由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渗透,就开始奠定了买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种投资大都发生于买办在羽翼丰满之后,和洋行没有直接的联系,有的就是与外资企业竞争,夺回利权作为成立目的。民族自尊始终在召唤这些买办回头,例如容闳称其充当宝顺洋行买办的经历为一段极其黑暗的时期,郑观应则对洋人“尊己抑人,任情蔑性”大为愤慨,唐廷枢也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机会一经成熟,他就毫不犹豫地辞去怡和买办职位,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职务,使招商局面焕然一新,正如一外国人所说:“当唐氏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②

买办将他们手中所积累的大量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式民族工业,资本开始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移,使通商大埠萌发出一种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气息,引起东南沿海城市的巨大变化,促进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有人“根据中国近代10个行业进行的统计分析,在1872—1913年,中国资本开设的新式企业共145家,已知的202个创办人或投资人中,按其原有身份来归类是:(1)地主和官僚为113人,占55.9%;(2)买办为50人,占24.8%;(3)商人为37人,占18.3%;(4)华侨为2人,占1%”。^③又例如上海,“在1912—1926年间,买办在上海投资开设的近代工厂约30家,占当时开设总厂数109家的27.5%”。买办不仅在近代新式企业投资中的数量甚多,而且其资本规模也遥遥领先。根据美国学者郝延平的估计,1872年—1893年,买办为中国人拥有的轮船公司提供了54.5%的资金,^④为中国近代煤矿提供了62.7%的资金,^⑤在1890年—1910年,买办为全国27家棉纺企业提供了23.23%的资金,^⑥在1883—1913年,买办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27.68%的资金。^⑦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侧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从而加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除了前述买办积极创办与所服务洋行相关的商业之外,在生产领域也是如此。如在面粉制造业中,从1895—1913年共创建现代机制面粉工厂28家,在已知的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43人中,买办占15人,占34.9%;使传统的棉纺织业由手工纺织向机器作业转化。在1890至1913年间全国共创办

纺织企业25家,在已知的41名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买办10人,占24.4%;在缫丝、毛纺、卷烟、水泥、榨油、水电、煤炭工业七项工业中,1872—1913年创办新式企业80家,在已知的103名创办人中,买办为21人,占20.4%;在轮船航运业,使传统的沙船业向近代轮运业发展,1872年—1913年,由买办创办的新式轮运业就占9家;买办的实践活动,还使传统的金融业向近代转化。近代金融业的形成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上个世纪末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世纪之交近代银行的出现。”^⑧以钱庄为例: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首先是旧式钱庄对新式银行的依赖与联系越来越密切。第一,由于买办的牵线搭桥使钱庄与外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外商银行对上海钱庄进行放款,后来随着本国银行的产生,钱庄就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从本国银行那里得到资金融通。第二,钱庄资本与近代工商业开始紧密联系,共同发展,沪上钱庄业把通过各种渠道积聚的资金转化为近代工商业资本,而且在国内外贸易中执行着金融枢纽的作用。在华洋贸易中,一般都由钱庄开立庄票,由买办担保之后作为华商向洋行付款的凭证,如果华商延期付款,多以钱庄出立的5—20天的远期庄票给付,洋商收票后,委托外国银行届期向钱庄收款,或由洋行直接向钱庄收款,华商则在货物售出取得货款之后再向钱庄付本偿息。钱庄既为华洋贸易充当了担保,又代理执行业务上的清算,在这一过程中,买办实际上是钱庄、外商、华商三者间的纽带。第三,许多买办投资或开设钱庄,不仅资助近代工商业,而且还积极投资于近代新式工商业。都是由商业而钱业,同时兼营其它行业。例如著名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叶澄衷等,都是经营钱庄的好手,同时又与新式企业联系在一起。钱庄业与新式工商业的结合表明钱庄资本已演化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买办促进了钱庄业功能的转化。

四、结语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造成条约口岸的开辟,引起东南沿海城市的变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东南沿海由于地处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要冲,受西方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其半殖民地的程度远较内地为深,殖民者主观上并非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从客观上又不得不允许中国部分地资本主义化;而内地因为远离通商口岸,受西方的影响相对比较薄弱,其封建性因素较通商大埠更为浓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是通商大埠的社会变

迁,而通商大埠的变迁又主要是指东南沿海城市的变迁,这种变迁,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化,使东南沿海城市由最初的流通领域的中心向生产领域的中心过渡,买办是这一过渡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买办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产物,又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反之,买办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东南的社会变迁,使东南沿海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买办虽良莠不齐,具有一定的反动性,但买办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应是进步的主张;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投身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则尤其难能可贵。因此可以说,买办是东南沿海城市社会变迁的动力与催化剂。

首先,买办是近代中外贸易的桥梁,如前所述,在近代中外贸易中,买办充当经纪人与媒介的作用。买办将东南各通商大埠与外商连接起来,同时又将各通商大埠与广大内地连在一起,促进东南沿海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

其次,买办创办或投资近代企业,促进了东南沿海的近代化。买办在服务洋行的过程中,深入了解近代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经验,并投身创办中国近代企业的具体实践中。他们创办近代企业的成功,为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作了一个模范作用,开创一代先河,掀起了东南沿海城市创办近代企业的高潮,增强了东南与传统经济的离心力。

最后,买办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部分: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实,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而言,不应将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他们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买办相应的应作为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去理解。

注释:

①②③④ 聂宝璋.中国买办阶级的发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P2-6 P390 P161.

③⑧⑩⑪⑫⑬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间的桥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P124 P77-89, P154 P156 P160 P161.

④ 刘广京.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1862-1874 [Liu Kwang-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ry in China, 1862-1874] [M] 哈佛,1962.P154.

⑤⑥ 孔令仁.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P328 P421-422.

⑥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A]盛世危言后编:卷8[M]上海:上海翰华阁书店,1921.P42.

⑦⑧⑨ 潘君祥、顾柏荣.买办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P91 P42 P42.

⑨ 马克思.对华贸易[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61.P57-58.

⑩ 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P344.

⑪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P222.

⑫ 陈雪筠.上海近代社会发展概况(1882-1931)[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P324.

⑬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P106.

⑭ 钱天达.中国蚕丝问题[M]上海:上海黎明书局,1936.P9.

⑮ 林黎元.“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29-56.P29.

⑯⑰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P114 P89.

⑱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P1591.

⑲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M]上海:1927.P14.

⑳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7.P974-975.

㉑ 资料来源:据上海华商公议会1906年编印出版的《上海租界华商行名簿册》有关资料统计,其中洋布业据1900年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会员数,见东亚同文会编,《佘那经济全书》第2辑。本文转引自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1年7月第1版。

㉒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P196.

㉓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P752.

㉔ 施正康.困惑与诱惑--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投资理念与实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P36.

㉕ 祝寿慈.中国近代工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出版,1989.P403.

㉖ 姚会元、邹进文.“江浙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71-85.P78.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杭州 310028)

(责任编辑:张燕清)